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入驻商家
docs river 文川网 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山西通志稿要

■ 张革非主编

■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順天府志卷七



圖經志書慶壽寺在時雍坊西南金元至元十二年重修其間多金元時碑刻及金人畫壁元商德符山水李衍墨竹劉伯熙古木皆在焉今為府城衆僧祈祝之都會云元一統志按寺碑金大定二十六年所建翰林侍講學士李晏誤文修撰黨懷英書丹國朝重修大慶壽寺起於至元十三年乙亥至十九年壬午工畢翰林學士承旨徐琰謨碑有曰海雲可菴皆葬寺之西南隅至元四年新作大都二師之塔適當城基勢必遷徙以遂其直有旨勿遷俾曲其城以避之又曰京師佛寺自來甲天下慶壽重修之後完葺雄壯又為京師之冠大德三年歲在己亥秋九月望日昭文館大學士書榮祿大夫平章軍國事行御史中丞領侍儀司事忽木石聖容之殿在大慶壽寺內佛殿之西北有殿曰聖容立上人青白石曾加及寶公真身在焉折津志在順承

中 国 方 志 学 纲 要

张 革 非 主 编

中国方志学纲要

张革非 主编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重庆 北碚)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经销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7.375 插页：1 字数：427千

1992年10月第一版 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00

*

ISBN 7—5621—0653—6/G·467

定价：7.20元

docsriver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前　　言

这本《中国方志学纲要》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接受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委托，为举办方志干部专业证书培训班编写 的教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新的盛世开展编修新志事业，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由各级地方政府直接领导，经过修志人员艰辛努力，已经取得重大成就，县志、市志接踵出版问世，在社会上产生相当重要的影响。

为适应教学需要，我们根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1985年公布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的要求，结合历届学员在修志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吸取方志学界的研究成果，在讲义的基础上编写了这本书，力求从多侧面、多层次探讨一些新的问题，以期对当今修志事业做一点微薄的贡献。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教学和编写书稿的过程中利用了来新夏编《方志学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黄苇著《方志论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林衍经著《方志学综论》（华东师大出版社1988年出版）等人的成果，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部冯玉荣同志提出许多宝贵意见，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提供大量资料在此一併深表感谢。

本书是集体编著的；第一、三章由张革非执笔；第二、四章由杨益茂执笔；第五章由金德群执笔；第六章由张革非、武月星执笔；第七章由张革非、杨益茂、洪京陵执笔；第八章由武月星

执笔；第九至十一章由洪京陵执笔。张革非设计了本书的基本框架，通阅全书和定稿。

我们由于水平所限，内容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欢迎方志学界同行和同学们指正。

编者于北京

1990年3月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	(1)
第一节 方志学的对象与任务.....	(1)
第二节 方志名称.....	(3)
第三节 方志种类.....	(5)
第四节 旧方志述评.....	(7)
第五节 方志的收藏、整理和利用.....	(20)
第二章 方志史略	(27)
第一节 方志的起源.....	(27)
第二节 汉魏隋唐时期——方志发展的初级阶段	(32)
第三节 两宋元明时期——方志发展的成熟阶段	(39)
第四节 清代前期——方志发展的兴盛阶段	(47)
第五节 清代后期——方志的蜕变	(51)
第六节 民国时期——方志的起伏跌宕	(54)
第七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新方志	(58)
第三章 方志理论	(65)
第一节 方志理论的产生	(65)
第二节 汉魏隋唐的方志理论	(66)
第三节 两宋元明的方志理论	(69)
第四节 清代前期的方志理论	(75)
第五节 清代后期的方志理论	(90)
第六节 民国时期的方志理论	(93)
第七节 当代方志理论的初步探讨	(97)

第四章 旧志体例	(111)
第一节 志书体例概说	(111)
第二节 方志源头的若干著述体例	(115)
第三节 秦汉至隋唐时期方志体例及举例	(123)
第四节 宋元明清时期方志体例及举例	(140)
第五节 民国时期方志体例及举例	(159)
第五章 新志体例和篇目	(164)
第一节 新志体例概说	(164)
第二节 新志的一般篇目	(172)
附一：新县志的一般篇目	(189)
附二：六部市志篇目设计的比较	(189)
第六章 方志资料	(214)
第一节 资料概说	(214)
第二节 近代资料（上）	(218)
第三节 近代资料（下）	(227)
第四节 当代资料	(259)
第五节 鉴别资料	(273)
第七章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与方志	(281)
第一节 经济概况与地方志	(282)
第二节 政治概况与地方志	(322)
第三节 文化概况与地方志	(372)
第八章 奋进的四十年是新编方志记述的重点	(397)
第一节 伟大变革的四十年	(395)
第二节 四十年的巨大成就	(402)
第三节 志书中如何记述建国后的历史政治运动	(423)
第九章 方志图表	(480)
第一节 方志图表的历史传统	(480)
第二节 图表在方志中的作用	(483)

第三节	新志图表的绘制和运用	(488)
第四节	要采用现代科学技术编制图表	(496)
第十章	方志编纂方法的几个问题	(500)
第一节	如何编写概述篇	(502)
第二节	如何编写大事记	(506)
第三节	如何编写专业志	(513)
第四节	如何编写人物志	(516)
第五节	关于行文、用语和称谓	(526)
第十一章	修志规划与实施细则	(533)
第一节	方志编纂方案的制定与实施	(533)
第二节	方志的审查、修订和出版	(533)

第一章 导言

中国修志历史长久，绵延两千余年，数量庞大，种类繁多，是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方志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积累起丰富的经验，形成一个完整的独立体系，有其理论，编辑宗旨，编辑体例，编辑方法，可以成为一个专门的独立学科。

方，指地方、区域；志，指记事、记载。凡属自然风貌、地理位置、土地面积、行政区划、建置沿革、城乡建筑、地质土壤、山脉河流、气候物候、矿物资源、植物资源、动物资源、城镇乡里、政权机构、党派社团、人口情况、民族分布、风俗民情、名胜古迹、工商财贸、文化设施、卫生体育、各种人物，无不备载。因此，方志除记事范围具有全国性内容的“一统志”外，都是记载某个特定地区的自然与社会，历史和现状的综合性著述。

正如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1985年公布《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要求的：“新方志应当系统地记载地方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为本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科学依据的基本状况，以利于地方领导机关从实际出发，进行有效的决策。”积累和保存地方文献，新方志对于正确认识省情、市情、县情，开发当地自然资源，促进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进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吸取经验教训均有重要意义。

第一节 方志学的对象与任务

恩格斯在《自然辨证法》一书中说：“每一种科学都是分析

单个的运动形态或一系列互相关联和互相转变的运动形态的。”方志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地方志，探讨方志本身特有的发展形态，方志内容的科学分类和方志门类之间的互相关系，以及载述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的整体结构、篇目布局，广泛程度和真实程度。方志是对某个特定地区进行分门别类和综合调查研究的成果，反映部门和地区发展规律，并探讨方志的编纂原则和方法以求达到“资政、存史、教化”的目的。具体说来可归纳如下几条：

1. 关于方志的产生

方志是怎样产生的？导源于何时？探明方志产生的原因和源头是研究方志的起点。有了这个基点就可以继续研究方志的发展与变化了。

2. 关于方志的历史

方志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基本状况，有什么共同点与不同点？弄清方志的发展史便于总结编纂经验，探讨方志本身的规律，掌握方志的发展趋势。

3. 关于方志的理论

方志理论是修志的精义。最初的修志理由，方志理论的逐步形成，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内容及其发展。方志的基本性质、特征和规律。编者的主体意识与载述客体间的关系。特别要着重探讨当代修志理论，以及对当前修志的指导作用。

4. 关于方志的编纂

方志确定什么宗旨？采用何种体例？运用什么方法？修志宗旨明确，体例框架科学，编纂方法得当，就有可能编出质量较好的志书。

5. 关于方志的收藏、整理和利用

统编全国方志目录，注明编者、修志时间、卷数、版本和收藏单位，将方志进行科学分类，有计划的翻印优秀旧志，并标

点、注释、考订，以便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第二节 方志名称

方志名称很多。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名称，即使同一名称，含义有时也不尽相同。随着方志事业的发展，体例的逐渐完善，方志名称的演变，反映着方志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现归类分述如下：

图经、图志、图记、图说、图考类。方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通称图经，并一直延续至今。如，唐《沙州图经》残卷（宣统元年铅印《敦煌石室遗书》本）、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3卷（《丛书集成初编》本）、宋张津：《四明图经》12卷（《宋元四明六志》本）、宋董弁：《严州图经》8卷（《丛书集成初编》本）、清刘宝楠：光绪《宝应图经》6卷。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40卷（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元郭荐：《昌国州图志》7卷（《宋元四明六志》本）、清刘统勋：光绪《皇舆西域图志》48卷、清刘文彻：光绪《海县厅图志》20卷、清黄沛翹：光绪《西藏图考》8卷。还有明陈渊：《练川图记》、清陆保善：《望都县乡土图说》等。

志、志略、小志、志余、志遗、备志、续志、补志类。以志命名可上溯《周官》，所载：“四方之志”。汉魏有陈述：《益州志》、吴韦：《三吴郡国志》。现存最早以志为名的是晋常璩：《华阳国志》。再如，唐李泰：《括地志》8卷（《岱南阁丛书》本）、清吴玉树：《宝前两溪志略》12卷（《吴兴丛书》本）、清顾镇：《支溪小志》（泰州市古旧书店传抄本）、清庄毓徽：光绪《武阳志余》12卷、清吴玉搢：《山阳志遗》4卷（抄本）、明董斯张：《吴兴备志》32卷（《吴兴丛书》本）、清周绍濂：嘉庆《德清县续志》10卷、清钱泳：《锡山补志》1卷。

(《锡山先哲丛刊》本)等。

记、录类。“记”、“录”与志含义基本相同。如，晋王隐：《王隐晋书地道记》1卷(思贤讲舍重刻灵岩山馆本)，唐陆广微：《吴地记》1卷(《学津讨原》本)、明沈谦：《临平记》4卷(《武林掌故丛编》本)、清阙凤楼：光绪《新疆大记》6卷、清七十一(椿园)：光绪《回疆风土记》1卷、宋史安之：《刻录》10卷(《邵武徐氏丛书》本)、清黄印：光绪《锡金识小录》12卷、清陈廷桂：同治《历阳典录》34卷、徐天璋：民国《泰州征献录》(抄本)、郭克兴：民国《黑龙江乡土录》等。

纪略、述略、要略、识略、辑要类。这些名称均有简、要、略的内涵。如，清杨宾：《柳边纪略》5卷(《辽海丛书》本)、清徐宗亮：光绪《黑龙江述略》6卷、清祁韵士：《西陲要略》4卷(《粤雅堂丛书》本)、清徐松原：道光《新疆识略》12卷、清王志沂：道光《陕西志辑要》6卷等。

旧闻、掌故、通览类。如，魏毓兰：民国《龙城旧闻》4卷、明徐献忠：《吴兴掌故集》17卷(《吴兴丛书》本)、清彭遵泗：光绪《蜀故》27卷、清傅崇矩：光绪《成都通览》等。

乘、考、系、表、鉴类。如，元于钦：《齐乘》6卷(《四库全书》本)、明王齐：《雄乘》2卷(上海古籍书店影印本)、明贵养性：《历乘》(今济南)19卷(北京中国书店影印本)、清侯宗海：光绪《江浦埠乘》40卷、清周有壬：《锡金考乘》14卷、钟镛：民国《西疆备乘》3卷、清七十一(椿园)：光绪《新疆舆图风土考》5卷、清师范：嘉庆《滇系》40卷、清七十一(椿园)：《军台道里表》1卷(《小方壶舆地丛抄》本)、卓宏谋：民国《蒙古鉴》7卷等。

此外，还有其他名称不再详列。

第三节 方志种类

中国方志类别很多，科学地区分方志的不同类型，对于正确认识方志的内容和意义，发展方志事业都是十分必要的。

按照行政区域和记事范围、记事内容的不同可区分如下一些类型。

1.一统志或区域志、总志。记事范围包括全国内容者曰一统志、记事范围包括大行政区域者曰区域志、记事范围在两省以上者曰总志。如元、明、清三代均有《一统志》。清和珅等修：《大清一统志》500卷，光绪二十八年刊本；隋虞茂修：《隋区域图志》；唐李泰修：《括地志》；宋乐史修：《太平寰宇记》；明徐学谟修：《湖广总志》98卷，万历十九年刊本。湖广包括湖南、湖北。

2.通志。记事范围限于一省者曰通志。如《畿辅通志》、《山东通志》、《广西通志》、《山西通志》，岑毓英等修；《云南通志》242卷，光绪二十年刊本。省是元代以来地方最高行政机构，通志由总督、巡抚领头修的多，私人修通志者极少。

3.府志。记事范围限于一府者曰府志。如《泉州府志》、《苏州府志》、《济南府志》、《南康府志》，魏笃等修；《寻州府志》38卷，同治十三年刊本。府是省以下的行政机构，府的行政长官称知府。府志多由知府领头修，私人修的也少。

4.州志。记事范围限于一州者曰州志。如江苏《直隶通州志》、《济宁直隶州志》、《泰州志》、《泰安州志》，汪殿瀛等修；《桂阳直隶州志》27卷，同治七年刊本。州的设置和职权历代有所不同，明清州低于府，清代又分直隶州与普通州。直隶州与府平级，州的行政长官称知州。

5.厅志。记事范围限于一厅者曰厅志。如《雷波厅志》、

《拉萨厅志》、《江北厅志》、《澎湖厅志》，余修凤等修；《定远厅志》26卷，光绪五年刊本。清代在新开发地区设厅，厅相当于府和县。厅的行政长官称同知或通判。

6. 合志。记事范围在两县或两县以上者曰合志。如《武进阳湖县合志》、《叙永永宁厅县合志》、《常昭合志》、《昆新合志》，萧鱼会等修；《石冈广福合志》4卷，嘉庆十二年刊本。

7. 县志。记事范围限于一县者曰县志。如《武清县志》、《辽阳县志》、《沁源县志》、《荣城县志》，邓钟玉等修；《金华县志》16卷，光绪二十年刊本。明清时代县是基层行政机构，县的行政长官称知县。县志占现存方志的绝大多数。

8. 乡镇志。记事范围限于乡镇者曰乡镇志。如《南翔镇志》、《杏花村志》、《双林镇志》、《菱湖镇志》、《法华乡志》，范来庚修；《南浔镇志》10卷，1936年《南林丛刊》本。乡镇志始于宋代，常棠修；《澉水志》载浙江海盐一个镇的内容。

9. 乡土志。记事范围往往以州县为限，侧重地方经济情况曰乡土志。如《双山县乡土志》、《宜川乡土志》、《辽中县乡土志》、《康平县乡土志》，洪汝冲修；《辽阳乡土志》1卷，光绪三十四年印本。光绪谕令编修，内容简明扼要。

10. 都邑志。记事范围限于城市者曰都邑志。如《长安志》、《新西安》、《天津市概要》、《杭州市新志稿》，叶楚伧、柳诒征主编；《首都志》16卷，1935年印本。

如果细分还有专业志、边关志、名胜志、山水志等等。方志学界关于方志类型有不同划分方法，上述仅是其中一种分类办法。

方志如按纪年区分，可归纳为两类：一是“通纪类”，内容从古通今，如宋乐史修；《太平寰宇记》；二是“断代类”，内容仅述某个朝代，或某些年代，如宋王存修；《元丰九域志》，还有各种“续编”多属这个类型。

方志如按文体区分，也可归为两类：一是“编辑体”，按一定体例分门别类汇编有关材料；二是“著作体”，由编者按照一定内容自行撰述，不旁征博引其他材料。同时也有编辑和著作相结合的类型。

方志如按体例区分，还有纪传体、门目体、“三宝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类书体等不同类型。

第四节 旧方志述评

我国方志内容宏富，种类繁多，门目齐全，体例完善，有章有法，自然和社会，历史与现状几乎无所不载，其中有精华所在，理应继承，也有糟粕，必须舍弃。

1. 关于旧志精华

方志是我国文化宝库中光芒四射的明珠。在历史上发挥过“资政、存史、教化”的重要作用。宋代朱熹到南康任职，当地官员备礼载酒欢迎，朱熹不予重视和理睬，开口便问：“志书可曾带来？”由此可见，志书为地方官了解当地情况的必备之工具。有些编者既善于撰述政绩，又勇于揭露问题，既表彰忠臣循吏，又贬斥赃官劣员，具有那个时代高尚的志德和情操。优秀志书均有朴实严谨，认真考核，褒贬有据，秉笔直书，存真求实的精髓。反映修志时代的特征和修志地区的特色。文字简炼，文笔清雅。如此等等，在有关章节还要述及。现先从几个方面探讨一些旧志的精华。

1，在政治方面官书正史不载少载的内容，志书有较多或详细的记载。李泰棻在《方志学》中说：“各地社会制度之隐微递嬗，不见于正史及各书者，往往于方志中见之，其一也；历朝文物，应登正史而未列，或在当日无入正史之资格，而以今日眼光视之，其人靡重者，亦往往见于方志，其二也；遗文佚事，赖方

志以存者甚多，其三也；地方经济状况，如工商各业，物价、物产等，其变迁多见于方志中，其四也；建置兴废，可以窥见文化升降之迹，其五也；古迹金石，可以补正史及文字遗缺者，其六也；氏族之分合，门第之隆衰，可与他史互证，其七也。”历代地方政府机构的沿革，人员编制，典章制度在地方上的实施，社会变革在地方上的演进，还有乡约条规等。姑且不论有关内容是否正确，都是后世探索这些问题的材料所在。如唐代地方节度使，宋代王安石变法，明代张居正改革，清代八旗制度，晚清咨议局等。

志书表彰封疆大吏，牧守乡贤，也姑且不论是非标准是否得当，甚至完全表彰错了的人物，只要事实准确，有些历史人物则是后世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既使需要改变旧志的结论，旧志也为研究这些人物提供了素材。志书编者对有关人物的评价不仅可以探讨评价具体人物的是非尺度，善恶标准，而且可以窥见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

志书载有农民起义，抗租、抗粮、抗税等斗争，还有人民群众反抗外国侵华战争，以及反抗外国教会的侵华斗争。如近代会党起义，光绪《贵县志》载天地会邱二娘起义事：“邱二娘，邑之桥墟来人，年三十许，常入市摆卖糖果。夫邱二，吸食鸦片，凡事听二娘之所为。二娘习见贼人技俩，遂旗聚众，出境劫掠。每打仗，头扎洋巾，骑马督阵，恶贼甘受鞭撻，竟忘其为妇人”。其中除诬蔑之言外，妇女率众起义很有参考价值。太平天国起义，关于拜上帝会成立于何时，史学界众说不一。民国《桂平县志》载：“洪杨起事于金田则在三十年，其结盟会则在二十六年。”当地县志有此一说很值得重视。还有关于捻军起义、苗教起义、回民起义、各地教案、义和团起义，以及资产阶级革命等。其中有关农民起义的记载虽然多数出自封建文人之手，但是，由于正面材料较少或没有，这些从反面记载的材料就显得十

docsriver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分可贵。而且有些材料为其它文献所无，因此，要了解过去的某些史事，方志则是不可缺少的。有关反抗外国侵华战争和所谓“教案”的记载多数具有中华民族的立场，伸张民族大义，贬斥民族败类。光绪《广州府志》载：道光二十一年“将军（指靖逆将军奕山）、参赞（指户部尚书隆文和湖南提督杨芳）之至粤也，以为粤民皆汉奸，有不问是非而杀之者。”又：“新安县武举庾体群，亦于（四月）初四夜半攻英船于虎门，一船俱毁，余船俱遁。又佛山义勇亦截击于龟岡炮台，据上风纵毒烟，以昧其目，杀数十人，又破其来援之杉板船”。同治《香山县志》载：“雷兆成、雷伯成、雷天枝、雷成珍、雷月、雷象、雷成南、雷道生、雷天简、雷天堂、雷天齐、雷成宇、郭景十三人，俱沙涌渡头村民也。道光二十一年二月，英夷犯境，村人雷成率等守下闸炮台，不能御。夷入村，带剑携火枪，大肆淫掠。十三人愤甚，……奋力击之，大呼，声震林谷，仓卒无枪械，各执耰锄殊死斗。夷挥剑杀数人，继燃火枪环击，皆死之。夷恐诸乡人至，乃遁。”又载：“渡头村雷成星妻刘氏，……道光（二十一年）辛丑，英夷入寇，及其村门，刘氏愤，执挺从雷兆成等挞夷人，战败被戕，死之，年二十四”。这些村民不甘民族压迫，奋勇抗敌，虽然都英勇战死了，方志为后人留下了他们的英雄事迹，否则也许要泯灭无闻。资产阶级不同于农民阶级，他们有自己的知识分子，民国时期修的方志有关资产阶级革命的材料多是旗帜鲜明的正确记载，并且往往是有首有尾，以及某些详情细节的叙述。

2，在经济方面志书中有较多的记载。例如，晚清社会在经济领域的变化，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商品经济的较快发展，机器工业的出现，国内封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对抗与斗争，中外在经济领域的抗争等。现举些事例：

关于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记述。乾隆《南雄府志》载：“夫

使民性质朴，男则耑力农功，女则耑事纺绩，居室足以蔽风雨，衣服足以敝形体，敦伦守分，少于争讼”。乾隆《乐亭县志》载：“以农隙之时，女纺于家，男织于穴，遂为本业。故布易粟，实穷民糊口之助云”。民国《元氏县志》载：“元氏以农为本，所食者率皆本地所种之粟，所衣者率皆本地所出之棉。男耕女织，终岁勤劳；常见农民自顶至踵，所用衣、袜、鞋、带，皆由自力织成者”。这些记载都是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典型景象，以及商品经济初步发展，农民利用农闲空隙之时，以副补农的情景。

关于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和解体的记述。同治《竹山县志》载：“昔时器具朴素，工匠惟土木居多。自邑有市集，行旅往来，陶冶金石之工踵至，制器亦渐精良”。自然经济在商品经济浸蚀之下，创制新的生产工具，促进社会演变具有重要意义。同治《襄阳县志》载：“泥嘴距城三十里，其西山多稻，聚米为市，舟车运载，襄樊资之。”米市兴旺必将促使自然经济解体，对农商产生重要影响。光绪《嘉定县志》载：“往者匹夫匹妇，五口之家，一织一匹，赢钱百文，自洋布盛行，土布日贱，计其所赢，仅得往日之半耳。”民国《佛山市忠义乡志》载：“镇，地扼两江上游，七省货物皆取道佛山，然后运出各省，故商务为天下最，而土产之美，手工业之巧，亦为远近所贵。自五口通商，洋舶揽载而奢、洋米搀夺而农奢，洋货充斥而工奢，儻焉不可终日”。民国《宝山县续志》载：“全邑各市乡，惟高桥僻在江左，昔称清溪，又别称江东，与上海接壤。西一大街，长一里有半，南北街长相埒，如丁字形，商铺二百余 家。以前布市颇盛，由沙船运往牛庄、营口者，皆高桥产也，今利为洋布所攘矣”。上述材料说明湖北竹山、襄阳，江苏嘉定、宝山与广东佛山等地自然经济的解体过程。

关于清朝被迫开埠通商后的一些变化。民国《法华乡志》

载：“静安寺在法华东北四里许，本一大丛林，无所谓市也。粤匪时，英商开辟马路，渐成市集”。民国《杭州府志》载：“拱宸桥市，去北关镇三里，地本荒凉，墟墓所萃，光绪二十一年，中日《马关条约》辟其地为商埠，设杭关于此，既而江墅铁路踵兴，设拱宸车站于桥西，市廛栉比，稍稍繁盛矣。”民国《开原县志》载：“光绪二十五年，中俄新约成立，准俄国在东三省兴建铁路，开原地当冲要，……指定小孙家台屯创立火车站。……宣统初年，各埠富商多在该站租界内辟盖房间，开设粮栈及各种商业计四百余户，凡海龙、东丰、西丰、西安及境内各屯粮石均运至小孙家台售卖，从前之荒僻小村，竟易为全境商务之中心点矣。”

关于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的记载。宣统《续修南海县志》载：“陈启源，字芷馨，简村堡简村乡人，少孤贫，笃学。……（咸丰）岁甲寅（1854年）至南洋，遍游名埠，考求机器之学。壬申岁（1872年）返粤，在简村乡创设缫丝厂，名曰继昌隆，容女工六七百人，出丝精美，行销于欧美两洲，价值之高，倍于从前，遂获厚利。……然以事招众忌，乃改创缫丝小机，以便小资本家经营，功用则与大机无异，而小机之利尤普，卒之风气日开，南（海）、顺（德）各属群相仿效。今（1910年）则全省缫丝均用机器，多至百余家，妇女之佣是营生者十数万人。……土丝出口现已达四千余万（两）。”民国《法华乡志》载：嘉定县“曹家渡在法华北三里。同治三年，英商开辟马路至梵王渡，地甚荒僻，绝少行人。光绪十八年，有人购地建筑油车，是为成市之始。继而，西段开办缫丝厂，东段开办面粉厂，招集男女工作，衣于斯，食于斯，居于斯者，不下数千人。由是，马路两旁造房开店，百工居肆而成市矣。面临吴淞江，帆樯云集，富商巨贾莫不挟重资设厂经商，除缫丝、面粉两厂外，若洋纱厂、织布厂、鸡毛厂、牛皮厂、榨油厂、电灯厂、不数年间，相继成立，

市面大为发达，东西长二里许，鳞次栉比，烟户万家。”

关于中外在经济领域相互关系的记述。各省机器局与民用工业的机器设备多数来自外国，对外依赖性很强，但又是独立自主的企业，“雇洋人而不为洋人所用”。轮船招商局成立后与英国怡和、太沽轮船公司展开激烈的竞争。有关地区的方志从不同角度或多或少有所记载。民国《潮州志》还有这样一条材料：“张弼士，名振勋，（广东）大埔人。壮年尚赤贫，至南洋群岛，不二十年致富千万，为南洋巨商，常乘英国轮船于槟榔屿、新加坡间。……（或乘）欧洲邮船经新加坡而至香港也。独德国公司明定华人不许乘头等船之例。弼士权我国驻坡领事，以事将返国，遣人持名刺向德国公司购头等船票，执事以张为华人，格于例，坚不售。张乃登广告于西文各报，招聘船员，购造商舰，往来新加坡各港间，专载华人华货，价照德公司减半，盖毁家以与德公司竞也。德公司经理人见此广告异之，询知其因，知张之财力既足，及此即以营业言，张亦不至大有损失，乃挽人诣张婉谢。张亦虑摇动其他商业，告以若除去华人不许乘头等船之例，则余此举可已，否则能毁家以争我国人面子也。德公司允之，由是此例遂废。”张氏先后出任清朝驻槟榔屿领事和新加坡总领事，在国内创办烟台张裕酿酒公司等企业。1905年清朝赏给头品顶戴，1910年任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辛亥革命后任华侨联合会名誉会长，1916年病逝于巴达维亚。

3，在文化方面志书中保存有地方的典章制度和其他文献。例如，民国《桂平县志》载《村规六条》，摘要如下：“一，编册。每村自为一册，缮写一样两本，一存官署，一发回村。不得参差挂漏，良歹分途。十家一甲，其甲头按月轮当，周而复始；二，点甲。听官示期到村点甲……摆设公案，绅耆迎接，每家出壮丁一名，手持器械，两傍排列听点；三，取保。各村点甲之时，有不到点者，除果系出外佣工生理，同甲注明保字不计外，

其有自知不法，一时规避，点后十日内，自愿改悔，向甲哀求者，当予以自新之路。同甲九家带领到官，当堂呈册。于本名脚下，注明同甲具保字样，求官免究；四，拿匪。该村经官点甲之后，十日以外，其果系甘心为恶，绝无悔心，该匪同甲通知合村擒拿送究。若在外为匪，时亦回村歇宿，同甲隐瞒，被同村或外村告发，其同甲仍不擒拿送究者，九家一同坐罪；五，合团。各村奉宪团练点甲之后，无论何村，捉贼锣声到处，四围村庄立即鸣锣，壮丁齐出截其去路。譬如东村捉贼，贼向西村逃走，而西村并无锣声丁壮接应者，东村稟官，即传西村甲首惩治；六，禁凶。凡应用团练军器，呈官编号，无事之时交保内收藏，不得私自借用。倘有三五成群，身藏小刀、大货，或因私忿，公然持枪，舞牌，扛炮，出入村墟，各村立即鸣锣，合拿解究”。这项记载对于了解强化地方保甲制度，加强对地方的统治很有裨益。再举两首小诗为例。其一，乾隆《甘肃通志》的诗文为：“谓盜所自来，尽以输官粮，官粮无定额，里胥任取将，诛求到骨髓，积逋终难量，赋繁田亩啬，岁入那堪债，纵剜心头肉，莫医眼前疮，相率宁为盜，暂免里胥戕”。这首诗不仅揭露清朝苛捐杂税的繁重，而且说明官逼民反的形势。其二，康熙《平顺县志》载知县刘徵以“人民”为题的诗文是：“普天之下莫非民，此地投生更苦贫。山瘠苗蕃无厚壤，水穷播种极工辛。鹑衣百结垂丝絮，霍食连餐杂柳羹。正赋输将如折骨，难图鸩鹄达枫宸”。这首诗说明人民在清朝统治下凄切悲惨的苦难生活。方志保存了这些很有价值的历史文献。

4，旧志揭露社会弊端，虽然数量极少，但是十分珍贵，例如，乾隆《南雄府志》载：“凡闽省大宪及钦差官员，与夫起解钱粮，贡献物料。其夫马供应悉派于里户，而地方官员所有执事铺垫器具什物，日用饮食，以至往来抽丰，无一不取于里户，且官为浮取以肥私囊，长随又加浮取，胥役更加浮取，值年里长分

派值年众里户，里长复加浮取。里户值当差之年，载粮一石须费六七十金，故鬻田荡产者有之，卖儿贴妇者有之，甚或逃亡失所，辗转于沟壑焉。于时有田者以田为累，而抛荒者不少。一二势豪又复飞粮跪寄致家，无垣角者亦须纳粮当差，故岁中亦多负欠。此往昔地方之弊也。”同治《畿辅通志》收录直隶藩司屠之申《直隶减差均徭疏》，直陈苛捐杂税繁重：“硃票一出，书役乡保逐层渔利；佐杂营弁群起分肥”，继而指出：官绅大户“免差之地愈多，则应差之地愈少，地愈少则出钱愈增，以致力作之农民，每地一亩出钱至二三四百文不等，较之正赋每亩征银一钱上下者多逾倍蓰”。“不办差之户愈多，办差之户愈少，而差钱则有增无减也。昔者十人而举千钧，今且一人而任之矣”。于是，“胥吏得以分肥，豪强得以包揽，使自食其力之小民，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蓄妻子。沾体涂足，终岁勤动，而摒挡差钱，有拆房荡产者，有因此卖妻鬻子者，有因此弃家逃亡者，困苦流离，死而无告。因而，盗贼窃发，民不聊生。此关心民瘼者，所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直隶“地当首善，差务殷繁”，大差之外，又有杂差，“如草、如料、如面、如炭、如天棚、如挑夫、如壕墙、如栅栏、如井盖、如井栏、如枣刺、如劈柴、如枝子、如秫秸等项，种种名目，离奇古怪，悉难枚举。俗云：衙门一点硃，民间一片血。……所谓衙门一点硃者，月月点之，日日点之，时时点之；所谓民间一片血者，村村出之，户户出之，人人出之。缘此杂差，既无一定额数，又无一定时期，可少可多，无早无暮，票甫出而钱即至。止在州县一举手之劳，而盈千累百已入私囊矣。呜呼！小民之脂膏几何？而能任此无厌之诛求”。他的结论是“直隶为首善之区，而邪教叠出，且有谋为叛逆者，盖由于教化之不明。教化之不明，由于民里之过穷。民里之过穷，由于大差之不均，杂差之不除耳。今诚能革除杂差，则民力渐舒，民力既舒，则教化可施，尚何有邪教叛逆之事哉！”

尽管这篇奏疏是从维护清朝政权出发的，但仍不能为清朝所容，清廷将屠之申交部严加议处。这些记载对于认识当时的社会真情实况大有好处。

上述仅就旧志内容简略概括一些精华所在。此外，旧志精华还有编纂原则、体例、方法等诸多方面在有关章节叙述，为避免重复，此处一一从略。旧志精华，理应继承，发扬光大。

2. 关于旧志弊端

方志虽然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一颗瑰宝，但瑕瑜互见，糟粕与精华共存。尽管这些糟粕作为历史上的一种意识形态仍有参考价值，但今后修志必须扬弃。章学诚评述旧志说：“方志久失其传，今之所谓方志，非方志也，其古雅者，文人游戏，小说短书，清言丛说而已耳。其鄙俚者，文移案牍，江湖游乞，随俗应酬而已耳。……方志既不为国史所凭，则虚设而不得其用。所谓觚不觚也，方志乎哉？”^①

刘光汉谓：“志之通病有七：曰文辞浮泛，曰意义复沓，曰新旧杂揉，曰浅俗不典，曰迂谬可怪，曰油俚不根，曰狷劣可憎。”^②

傅振伦称：方志通病有十：“一曰：取材无当，旨趣乖僻；二曰：因习模拟，书多雷同；三曰：剽窃拼凑，无异类书；四曰：割裂诸志，无所断制；五曰：片断记载，几不成书；六曰：门类琐碎，意义浮泛；七曰：载文纪事，猥烦不典；八曰：叙述无谓，立论可厌；九曰：逐于景物，不求实际；十曰：官家修志，失之简陋。”^③

上述所指均有其实。评述旧志弊端者，古今大有人在，此处不再胪列。为便于学习，我们概括旧志四条主要弊端，以供参

① 《文史通义·方志立三书议》。

② 转引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

③ 《中国方志学通论》。

考。

1. 主旨乖巧，立论偏颇

旧志常以正统的纲常伦理为主旨，投合封建统治者提倡修志以达巩固政权的目的。南宋浙江《咸淳临安志》首列“行在所录”，以及“诏令”、“御制文”。后世相因，皇言宸翰刊于卷首，以尊崇君权。乾隆河北《永清县志》设“皇言纪”、“恩泽纪”。乾隆湖北《麻城县志》设“皇朝大事记”。《湖北通志检存稿》设“皇言纪”、“皇朝编年纪”。乾隆《登封县志》设“皇德记”。这些恪守封建等级制度，尊皇求荣，取媚当朝，虽称乖巧，实为糟粕。嘉庆《广西通志》和道光《广东通志》改称“训典”。光绪《山西通志》删削“皇言纪”设“巡幸记”，为有识之举。

旧志人物传连篇累牍表彰权贵的所谓“德行”、“义举”，以行欺世骗人之术，浮词溢美，很少事实。阮元指出：“明代事不师古。修志者多炫异居功，或蹈袭前人而攘善掠美，或弁髦载籍，而轻改妄删。”^①使志书趋时附和，很不真实。更有甚者，托情贿赂，不该立传的立传，或勾心斗角，彼此攻讦，本该立传的而被删除。章学诚指出：“志乃史体，原属天下公物，非一家墓志寿文，可以漫为浮誉悦人耳目者。间近世纂修，往往贿赂公行，请托作传，全无征实。”^②道光《泰州志》好似高鸾家乘。这种舞文弄墨，巧于攻心，取媚权贵，言过其实的记载应属糟粕之类。乾隆《南雄府志》江璞在“成化甲辰志序”中指出：“世尝病为志者率多考据欠详，浮泛少实，好恶不公，予夺失当。豪门宦第虽不可书者亦书之，闾阎旧族虽当书者亦不及，甚而事无统纪，理或舛说，冠履倒置，薰莸杂列。好高者……不知天地之理无往而在，自溺者徇异而并弃其常，不知邪正之分，截然而

① 阮元：道光《重修仪征县志序》。

② 章学诚：《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

不可乱，此世之通病也。间有不冒是病者亦鲜矣。呜呼！此志之所以无足取信于天下后世也”。

旧志列女一门往往占很大的篇幅，光绪《续修稷山县志》，共两卷，列女占其半，宣扬封建节烈观念，冗长乏味，张扬节行寡欲，以封建伦理摧残妇女。褒词连篇，内容甚少，套语抄袭，千人同面。光绪《南通州志》说明：“列女志古无系以表者，嘉庆《盐法志》，始创为之，郡人杨廷樸《咫闻录》即用其例。今立年例表，书其姓氏年岁，而事迹较著者，分传于后”。近世尤重节烈，什么终身守寡，继妻殉夫之类则大肆渲染。这种糟粕谬论必须彻底抛弃。

旧志宣传天命观、宿命论、天人感应、因果报应、神怪迷信、世俗偏见、颠倒是非在在皆是。例如，明正德《武功县志》载：典史张仪“刻薄狡险，善虐其民，取之极骨髓，及语百姓则曰：吾为吏廉士大夫不知也，即有弗廉，我安敢昧城隍。城隍灵，当使我父子横死同日。不逾年果父子同日死。壮兵祇候仪宅者，是夜未寐，见二长须人，皂夜持锁，突入仪寝，兵以为同事者，俄传仪子死，兵亟寻持锁者，内无有也。乃仪亦暴死日中”。此事或有巧合，宣扬因果报应，以谢民怨。酷吏恶果当载，但应剔除迷信糟粕。

2. 隐恶扬善，言之不实

旧志义例隐恶扬善者多，褒贬互用者少。康熙《太平府志》在序言中规定：“纪善不纪恶”。乾隆《三河县志》主张：“意在表扬，惟善是与”。乾隆《博野县志》主张：“扬善”。乾隆《乐亭县志》主张：“彰善”。乾隆《容城县志》主张：“旌扬”。同治《新繁县志》在例言中说明：“史家者体，褒贬互用，为万世之劝戒；志则有褒无贬，善善从长，微善必录”。其实志体并没有形成“有褒无贬”的原则，历代均有“褒贬互用”的志书流传于世。这类“纪善不纪恶”的方志，全书都是赞扬之

词，凭空虚构，华美无实，浮载功绩，君皆圣主，臣皆忠良，文皆鸿儒，武皆战将，一切以统治阶级的风貌为善，言行为是，脸谱为美。诚如周林所言：“官曰慈祥恺悌，士曰孝友端方，学皆鸿儒，女皆贞妇”。^①无所谓暴露、贬斥，对于人君惟顽与暴，反道败德，臣下贪污腐败，怨声载道，社会黑暗，民不聊生，特别是对于统治阶级欺压人民，剥削百姓等罪行，除镇压人民反抗和起义有所记载外，其他很少记载。这就完全违背了客观真实。

3. 冗长浩繁，泛载滥记

方志内容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本应有严格的取舍标准，体例和门类设置也应与内容相适合。沈世枫指出：“而近今之志，非杂即鄙，无稽者据为典要，不驯者搜为艺林，凡国计民生之利害，茫然无所据。其于治道何补哉？”^②张澍说：“世之为志者，广分门类，妄撰杂事。于本邑掌故，反多遗漏。……且地理不纪四至八到，山川不言险要攻守之略，纪人物不详行宜，专取他邑尊显者人之以为荣，滥收风云月露之诗文以侈卷帙，此通弊也！”^③章学诚说：“夫为政必先纲纪，治书必明体要。近日为州县志者，或胥吏案牍，芜秽失裁，或景物题咏，浮华无实。而求其名义所归，政教所重，则茫然不知所指焉。”^④又说：“州县修志，尤以多序为荣，隶草夸书，风云竞体，棠阴花满，先为循吏颂辞，水激山峨，又作文人通赞。千书一律，观者索然。”^⑤贪载传奇，装点名胜。《四库总目》张圣诰《登封志》注云：“他志景必有八，八景之诗必七律，最为恶习”。乾隆《曲沃县志例》称：“八景之外，增益二景，字义调叶，允皆风

① 周林光绪《密云县志序》。

② 沈世枫：乾隆《广平府志序》。

③ 张 淬《养素堂文集·代赵及莽修大足县志序》。

④ 章学诚：《石首县志序》。

⑤ 章学诚：《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

雅”。《上元县志》罗列四十景。这种风花雪月、溢美之文，实无其味。道光《太康县志例》说：“大吏邑侯，文人墨客，即事题咏，采择付梓，亦足增邑乘之光。”其实，事得其反，不仅无光，反为糟粕。

4. 因袭模仿，泥古不化

旧志多有因袭，嗜古成癖，抄窃为书，文多雷同。傅振伦指出：“志孝弟则云生有至性，志行义则云性好施予，品皆曾、史，治尽龚、黄，学必汉儒，贞皆姜女。面目如一，性情难求。志之功用，盖失之矣！”^①洪亮吉在乾隆《登封县志》叙录中说：“曰皇德记，则仿侯《汉皇德记》也；曰舆图记，则仿隋志《周舆图记》也；曰土地记，则仿晋朱育《会稽土地记》也；曰山川记，则仿齐刘澄《永初山川古今记》也；曰大事记，则仿汉司马迁等《大事记》也；曰道里记，则仿隋《西域道里记》也”。如此等等，仿古泥古。寿鹏飞在《方志通义》中指责旧志弊端说：“人言志例，我为拘牵，人言新政，我为附和，人言利源，我为宣传，人言自治，我为耳食，人言欧化，我为盲从，人言建设，我为铺张，人言金石，我为滥载，人言名胜，我为流连，不察现状，不究是非，道听涂说，茫无归宿，今之作者，大抵如斯”。这类单纯模仿旧志，没有创新的志书，不能反映时代风貌和地方特色，因而失掉修志的意义。旧志糟粕必须批判，完全抛弃。

何谓旧志精华，何谓旧志糟粕？志书读者要分辨，志书编者更要分辨。如何才能分辨清楚？必须正确掌握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否则可能将精华当糟粕，也可能将糟粕当精华。

① 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

第五节 方志的收藏、整理和利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面开展，整理和利用方志中关于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的资料受到各行各业的重视。周恩来总理1958年说：“我国是一个文化悠久的大国，各县都编有县志，县志中就保存了不少关于各地经济建设的有用资料。我们除编印全国所藏方志目录外，还要有系统地整理县志中及其他书籍中的有关科学技术资料，做到古为今用。”^①地方志是贮藏万事万物的宝库。明清之际学者顾炎武利用一千余种地方志编著《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利用方志研究我国沙漠的变迁获得重大成就。天文学家徐振韬、蒋窈窕利用方志关于太阳黑子活动的记载，十七世纪有二十余条材料，其中六条是在太阳活动的衰落期之内，从而纠正了国际天文学界的一些论断。英国《泰晤士报》1980年2月4日介绍他们的研究成果，引起国际天文学界的重视。^②云南省云龙县根据旧志所载矿藏资料和古代开采银矿的记录，经过研究和论证，决定在当地开发锡矿和银矿，改变了贫穷的面貌。班固著《汉书·地理志》：“上郡高奴县（陕西延安一带）有洧水，肥可燃”。这是世界上关于石油的最初记载。

整理与利用旧志首先要摸清方志的收藏情况和编制全国收藏方志的目录。1958年宋士嘉增补订正1935年旧作《中国地方志综合录》，该书著录四十一所图书馆7413种方志。

根据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最新统计现存方志共有8264种，其中宋以前3种、宋28种、元9种、明942种、清4889种、民国1187种，清

① 转引自新夏：《方志学概论》，第141页。

② 见《书林》1980年第4期。

docsriver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宋及民国年间的志料及其它1206种。共计十馀万卷，约占我国现存古籍的十分之一。方志数量如此庞大为世界各国所罕见。但这仅是我国所编方志的一部分，佚传方志数量也很庞大。该书没有收录一统志、区域志、总志、山水志、寺庙志、名胜志等。虽然著录190个图书馆、博物馆、文史馆、档案馆所藏。其中县级图书馆仅有六个，显然仍不是一个完全的方志目录。据估计，我国现存方志应有一万余种。

据张国淦编：‘中国古方志考’统计，从秦汉至元代见于文字记载的方志二千馀种。又据‘明史·艺文志’等书所载，明代方志约计三千种，其中大部份已经散失。明代河南辉县、嘉靖、万历、天启三次修志，现存多为残卷。河北‘蔚州志’，明代成化、嘉靖、崇祯等修过四次，除一次未修成外，其余三志都失传了。天一阁藏书楼明代方志，原有435种，现仅存266种。清代和民国方志散失也相当严重。

北京图书馆收藏方志六千多种、上海图书馆收藏方志五千四百种、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收藏方志四千多种、南京图书馆收藏方志四千多种、天津图书馆收藏方志三千六百馀种、大连图书馆收藏方志三千种、上海辞书出版社收藏方志二千馀种，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中央民族学院、福建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均收藏相当数量的方志。

我国方志大量流散国外。

美国通过驻华机构，文化人士和传教士广泛搜集中国方志。朱士嘉编：‘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厂1942年出版），著录方志2939种，其中宋志23种、元志9种、明志68种、清志2376种、民国方志463种。此后美国国会图书馆又编‘续编’，著录方志300馀种，后发展到4000馀种。

美国犹他家谱学会不仅收藏中国大量家谱，而且收藏中国大量方志，并拍摄微型胶卷，到1979年止已达130万卷，共收藏中国方志5000余种。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华盛顿大学，也分别收藏中国相当数量的方志。

日本运用与美国相似的手段，通过驻华机构、文化人士广泛搜集中国方志，并在侵华期间掠夺大量方志。日本收藏中国方志的主要单位有日本国会图书馆、东洋文库、静嘉堂文库、内阁大库、宫内厅图书寮、尊经阁文库、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京大学附属图书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天理图书馆等，共收藏中国方志4000余种。值得一提的是1907年日本购得浙江陆心源皕宋楼所藏珍本方志。日本编辑中国方志目录有：东洋文库编：《东洋文库地方志目录》（支那、满洲、台湾），东京，东洋文库1935年出版。东洋学文献中心联络协议会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东京东洋文库1964年出版。《天理图书馆从书》第十九集：《中文地志目录》，天理大学出版部1955年出版。山根幸夫编：《日本现存明代地方志目录》，东京，东洋文库1962年出版、1971年又出版《增补》本，著录日本十二个图书馆中国明代方志300余种。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参考书志部亚非课编：《日本主要图书馆、研究所所藏中国地方志总合目录》1969年印行。日本台湾总督府图书馆编：《台湾总督府图书馆所藏中国地方志目录》，1939年印行等。日本所藏中国方志有些珍本，如静嘉堂文库藏宋志《咸淳临安志》、《咸淳毗陵志》，内阁文库、东洋文库等藏有明清孤刻本方志50多种、明清稀见本方志80多种。再如天一阁藏《嘉靖和州志》残存8至15卷，日本内阁文库存有17卷足本。

法国巴黎大学教授吴德明编：《欧洲各图书馆藏中国地方志目录》，巴黎，莫顿公司1957年出版，著录法国、英国、意大利、德国、比利时、荷兰、瑞典等国二十五个单位所藏中国方志